

石仲泉 著

我观

毛泽东

增订本
上

济南出版社



石仲泉 著

我观

毛泽东

增订本 上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观毛泽东：全2册 / 石仲泉著. 一增订本.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488-1091-9

I. ①我… II. ①石…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①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9244号

我观毛泽东

石仲泉 著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地址：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邮编：250002）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210 毫米×285 毫米 1/16
印 张	62（全2册）
字 数	1158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8-1091-9
定 价	180.00元（全2册）



作者简介

石仲泉 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首席专家。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党的理论和党史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长达八年之久。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二集》、《长征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艰辛的开拓：石仲泉自选集》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等。新近出版《我观党史》（三卷本）、《党史热点面对面》。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2013年增订版序

《我观毛泽东》增订本改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从原书名《毛泽东的艰辛开拓》1990年出版以来，这是第五版了。从10年前的第四版开始，改为现书名。每次出版，出版社都希望写篇“序”，说说感言。转瞬即逝，10年过去。这次也照章行事，写第五个“序”言。

还在24年前写第一篇“序”时，我曾讲过：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毛泽东观。随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和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论著的传播，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会存在越来越大的反差。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文化积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当时有这种预感，但主要是理论论断。走过了四分之一的人生路，从社会所见、从学界所观、从网络所传、从人们所议，这种感受越来越明显。有些不同看法几乎形成对立两极，观点针锋相对，“论战”异常激烈。有的论著影响相当不小，而且似乎形成新的“派性”，这是未曾想到的。不同观点进行学术探讨、展开争鸣是正常的，也应当提倡。我很欣赏十七大报告讲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八个字。但现在学术的包容性不很强，正常的争鸣不很多，而情绪化渲泄、偏狭性独断，乃至人身攻击却在网上不断传播。这说明建设学术民主，形成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还有相当不短的路要走。

毋庸讳言，像我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来自农村，所受学校教育和走向社会参加工作都还算比较顺，对共产党是感恩的。在1951年读初中二年级写作文，我选的题目就是写毛泽东的青少年故事。在中学入党，在大学学习哲学，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以后工作长期在中央机关。这个经历自然对我影响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的研究对象又主要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一辈子都与研究毛泽东为伴，成了毛泽东的终身研究者。

我个人尽管对毛泽东是很崇敬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但作为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还是努力坚持全面的、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态度。我以为，毛泽东是个既有伟大功绩又有严重错误的党的领袖，也是既有非凡才气又有特别个性的历史伟人。但如

1981年“历史决议”所说，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我的著述始终坚持“两点论”：既充满激情地讲他的伟大功绩，也深表痛心地讲他的严重错误；既不因为他的伟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不因为他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而贬损他的伟大功绩。对他的错误也尽量采取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既然他的错误已经犯了，将认识长期停留于指责、批判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像邓小平那样，把错误视为宝贵财富，做能量转化工作，将负能量变为正能量。这在我的书中都说到了。

这些年我在不少场合讲过“布道”和传承问题。2011年底在韶山参加第四届“毛泽东论坛”开会期间对毛泽东纪念馆、遗物馆的同志讲过，要以“布道”精神来宣传毛泽东，传承好作为精神遗产的毛泽东科学理论。今年“七一”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我作为顾问也在会上讲了这个问题。我说：“布道”精神，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而这首先需要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有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以“布道”精神来“布道”。这里的“布道”，当然包括布毛泽东思想之道。所谓传承，也包括将毛泽东的科学理论和一切正能量传承下去。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既然是宝贵财富，我强调它的史鉴和警示作用。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文章中，我对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曲折和挫折是正视的，认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要起刻骨铭心的警示作用。显然，这里讲的包括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史鉴和警示。采取这种态度，我以为，这是研究党史包括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性要求，也是对党性、良心的拷问。我得到的反馈信息，很多人包括不少学者和老干部都赞同我的观点和态度。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今后继续研究毛泽东的历史责任就是两条：一是“布道”和传承，二是史鉴和警示。

2011年底在韶山，我到毛泽东纪念广场现场考察了数万人给毛泽东庆贺冥寿的盛况，使我感到震撼。那真是万众拜寿，不仅仅是韶山人、湖南人，还有相当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有新疆、陕西、黑龙江、内蒙古、北京、上海、安徽、湖北、江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各省的，还有穿军装的部队同志。12月25日晚上整个通宵都是人头攒动，络绎不绝，鞭炮火山，花篮海洋。第二天一清早是“万人同唱东方红”、“万人同吃福寿面”。从各宾馆到大广场都是免费供应寿面，游人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生日期间到韶山，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盛况。我问过一些同志，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家乡，他们那里的领导人的诞辰期间有无此种情景？回答说，在近处的刘少奇家乡，远处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家乡都没有。当然，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我询问过，有感恩的，有祈福的，有怀旧的，也有旅游的。表面看来，毛泽东似乎又走上了“神坛”，但应当说与“文革”时期的“神坛”

不能同日而语。它显示了一种“毛泽东情结”，一种来自草根的人民力量。

这次考察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走向使我更加坚定了逐渐形成的两个“守护神”思想。2012年8月上旬，我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在新疆喀什召开第十九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我在会上的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我说：中国共产党既然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那么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科学地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用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今天，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今天。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上，不管遇到怎样的曲折，也不管会对某些历史事件作出怎样的结论，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能动摇。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共同体。动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要维护，但必须是“科学地维护”，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是他们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允许人家善意的即使是尖锐的批评，以作为历史教训认真记取。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始终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最大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永葆执政青春。去年，这个讲话没有发表，尽管一些刊物抢着要稿，但我担心是否“冒”了。一年过去，我更坚定了这个信念。因此，收入在本书之中。

这个增订本共增加了20多篇文章，30多万字，包括原来的68万字，总字数过百万了，因此分为上下两册。本书的编目作了一些调整，使之更能集中地展现各编主题。这样，“导论”加上七编，共八部分。为保持历史原貌，除错别字外，都没作改动。增订本能出版，要感谢济南出版社这个老伙伴。11年前，他们抢着出版了《我观党史》第一卷。去年出版了《我观党史》三卷本和《党史热点面对面》。今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又要求出版此书。对于出版“红书”的这种热情，我很受感动。因此，我要表示感谢。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关门博士弟子郑宁波，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和联络事务。没有他的努力，这本书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赶出来。

作者 2013年7月25日于北戴河

新版的话

《我观毛泽东》是在《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基础上，再次增订而出的新版。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是在1990年开始出的第一版。那时，研究建国以后的毛泽东的书还不是很多。由于工作关系，我对这个问题涉猎得早一些。第一次印刷两万多册还不能满足需求。应出版社要求，1992年出版了增订本；1996年又出版了新增订本。尽管该书多次印刷了数万册，书市上写毛泽东的书也不知有多少，但承蒙一些读者“错爱”，这些年仍有不少教学和研究人員，还有一些离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向我本人或出版社索取该书。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出版社准备再版拙著。自新增订本出版以来，我又写了若干篇研究毛泽东和与毛泽东相关的文章，也将编进新版。这就要出新增订本。2001年，济南出版社出版拙著《我观党史》引起一些读者对这个书名的兴趣后，我已萌发了要不要对我已有的书再版时改名的念头。今年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后，个人比较自由了，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宽裕了许多，对今后的研写“任务”大致作了点规划。其中一项，就是将已写的和将来准备写的书整合成系列。在拟定的系列书中，首先考虑的是“我观”系列。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将该书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出版图书后，我已倾向于将该书改名为《我观毛泽东》。但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后，思想发生了反复。尽管有赞同、鼓励我改名的，还帮我列了几条理由，但不赞成者却讲了一个重要观点：要有品牌意识。这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已成为一个重要品牌，有读者、有市场，以不改为好。因此，在我今年9月离开北京去四川继续走红军长征路之前，已告出版社不改名了。这外出一个半月，在从四川经甘肃到陕西走红军长征路和毛泽东转战陕北路的旅途中，也在权衡是否改名的问题。对毛泽东的那种往往不遵循常规、作出人意料决策的思维方式，通过实际考察，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这方面的某些感受，促使我下决心还是改名。在我写这篇话时，尽管还未将这个意见告出版社，但这个决心不会再变了。

新版《我观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原有的文章，除出版社将发现的个别文字印刷错误作订正外，我一字未改。一是没有时间，二是保持原貌。既然我过去

研究毛泽东的观点已成历史，那就让读者来认识那个时候的我吧。尽管书中打上的那段历史的烙印相当深，以至有的看法和表达方式，不仅跟时下的很不协调，而且与我个人现在有了变化的认识也不相一致，但还是没改，留给读者去品评为好。

新版增加了12篇文章，包括刚刚“出炉”的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写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一文。这两年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我曾经说过：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丝毫不意味着要去贬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到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我还要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论该文写得如何，总算兑现了我的承诺。

关于毛泽东要说的话，在那篇拙文中大致都说了。因此，这篇前言就不必像前三篇那样再发一通议论。

还有一句话不能不说的：书中观点全是个人愚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希望在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毛学”领域，有更为生动活泼的“双百”氛围。我诚挚地欢迎研究者和其他读者对鄙人的所有拙著提出批评意见。

作者 2003 年 11 月 3 日于寒舍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序

这本书出版了两次，印行 25000 多册，据说都已销售完了。这次重新增订再版，除将原书中的一些文字作了校改外，主要增补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至今年初写的 10 篇文章。

按惯例，一本书再版，作者要唠叨几句。我也难以摆脱这个定势。

这次再版，讲三点想法。

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确实博大精深

说实在话，一个时期，我不爱用“博大精深”四字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伟大性。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被用得太滥、太绝对了。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感到，尽管这是一个“陈词”，但还是不得不用。

第一，毛泽东不仅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他留下的论著、讲话等各种文稿估计达数千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著作有特殊的魅力。读他的书韵味无穷，能使人浮想联翩，开阔思想，启迪智慧。不用这个词，似不足以表达那种感受。

第二，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并不排斥承认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因为就“博大精深”一词的本意讲，只是形容知识渊博、思想精邃，并不是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关于认识是否完全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思想理论的“博深”性与思想理论的真理性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滥用“博大精深”，使其几乎成了“绝对真理”的代名词，那是一种狂热。在狂热之下，不讲科学、混淆概念，不足为奇。经过拨乱反正，在已经将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伟大与迷失区别开来之后，再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包括通过透视他晚年的错误理论而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某些“真理的颗粒”，会真正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理论的“博深”性。这种“博深”性不等于真理性，不是要把毛泽东那些错误的东西也说成正确的。我想，只要思想上明确了这一点，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那么，说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就既

不是一句溢美之词，也不会引起其他歧意。

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再次达到了高潮。据悉，这一年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达5000多篇，出版的有关著作达600多种。1994年，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在继续，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仍然不少。1995年发表的论文仍有1000多篇，出版的著作仍有70多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的巨大影响。

当然，对毛泽东的研究数十年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这有许多原因。首先它无疑与我们党和国家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定、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著作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这一点，仅靠外力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成为时下国内学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即我在前几年讲过的“毛泽东学”。在不少学人看来，“毛泽东学”好比一座蕴藏量极大的富矿，可供长时间地开采和加工，生产和研究。因而，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不时地掀起高潮或热浪。

二、进一步将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事实上的“毛泽东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现象。经过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空前规模的研究和出版高潮之后，如何把对毛泽东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已成为广大“毛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责任。要成功地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有很大的难度。这里不从大角度去立论，仅从具体地进行实际研究而言，在当下一段时间内，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摸索：

一是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在过去一段时间，文献档案资料的发表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有关部门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献档案资料是空前的。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卷、《毛泽东文集》2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毛泽东文史批注集》1卷、《毛泽东外交文选》1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卷，还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3卷等。《党的文献》杂志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都属于文献档案资料性质的，总共达800多万字。固然不能说，重要的文献档案资料都已完全发表（有关部门今后将继续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集，公布党的文献档案），但这样数百万字的原始性材料为把毛泽东研究引向深入开辟了广阔天地。对这些材料的消化利用，是“毛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回忆录），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包括重要的回忆录）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可谓是“毛学”研究的大丰收。尽管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一大批成果的质量，但这些年的有些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胡乔木文集》（3卷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著《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吴冷西著《回忆毛主席》等，此外还有《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 and 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等。这些论著是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毛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同志的论著不仅披露了许多翔实的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论著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提出的观点都极富启发性。因此，对这些论著就值得认真研读。如果把“毛学”研究比喻为攀登高峰，这些论著应当视为向前攀援的基地。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不是都厌烦研究和出版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吗？产生这个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起点低、目标低，即前进的基地不是这些一流的大作，奋斗的目标也是无意去创作较高水平的大书。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提高编辑水平，改革出版制度等。但是，树立攀登高峰的意识，提倡攀登高峰的精神和把握好攀登高峰的基地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立足于当代，寻找新研究视角，探索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观点、方法可谓三要素。提高研究水平，这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有了基本文献资料，有了好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就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毛学”研究在一个时期使人产生陈旧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研究论著没能摆脱以往的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兴起，不少论著颇具新视角，面貌大变，很受欢迎。这是近年“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毛学”研究水平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还应当提及的是，这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纪实作品热”，尽管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作品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作品对毛泽东研究和有关的出版工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表达方式而言，把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的显著优点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是往往缺乏科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当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陈旧表述方法的一个契机。

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活跃研究气氛。这些年“毛学”研究空前活跃。若不是如此，不可能一年之内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面

世。但是在大面的活跃中也有小不活跃的一面，即“花儿盛开，鸣而少争”。有这么多论著，可以说得上“花儿盛开”。但是许多论著都是各“放”各的，各“鸣”各的，相“争”者少，故曰“鸣而不争”。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显然是指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就学术问题包括“毛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提倡争鸣的。这是繁荣“毛学”，把“毛学”研究引向深入，并推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有本《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的书，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界定说：“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作者经过缜密研究后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普遍地认为也是最保险的。我并不是要非议这个定义。但是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议论，认为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是为了立住党的指导思想战略需要而作的。这是属于“不搞争论”的范围。但是《历史决议》没有说，任何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甚至主管领导部门也没有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都要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总定义来分别界定。因此，主张不必套用《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的那几个要素，而突出毛泽东个人在上述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或方面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作用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加以定义。与前面注重“引经据典”的思路相对而言，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强调上述各方面思想的学术性，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两种意见，或者说两种观点，可能各有长处，但也会各自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属于这类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允许争鸣。不讨论、不争鸣，有些矛盾揭示不出来，有些道理不能说透。而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地揭示矛盾，讲清楚道理，使真理愈辩愈明。这也是推动“毛学”研究的一个途径。

三、应当继续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简称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这些年来人们关注、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大多数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产生困惑，不能正确对待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偏向，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种偏向是以邓非毛，即把小平同志这些年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看成是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把小平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也加以否定，好像毛泽东一无是处。这种偏向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虽然是个别的，但近来海外诽谤毛泽东的出版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进来，对国内一些人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另一种偏向是以毛非邓（至于那些既非毛又非邓的，属另一种性质问题，当作别论）。在80年代末的风波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包括对苏联、东欧紧接着发生的逆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以及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实际上，小平同志也在反思。1989年6月9日他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反思之作。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错，基本路线、战略目标都没有错，应当“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①。后来又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②。他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集中地表达了他反思后的新认识、新结论。这种反思是科学的、正确的，代表了全党反思的主流。也有一种反思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的做法，偏离了毛泽东思想；不讲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只抓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不符实。特别是这几年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些方面出现滑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强有力的遏制、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种情绪和观点越来越发生影响。

我个人认为，尽管矫正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工作实践的问题。党的各项工作跟上去了，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困惑认识甚至糊涂观念就容易消弭。但是就理论方面而言，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的。

一是要继续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晚年有错误，并且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是上了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对这一点要十分明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根本没有否定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言，那是对立的，两者是否定关系。但是，就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而言，两者则不是对立的，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书新增补的几篇文章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二是对现实和理论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对邓小平理论产生困惑，除了对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保留看法，这是一种情况外，还有的，就是对现实与理论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缺乏正确认识，认为邓小平理论虽好，但与现实很难对上号，因而怀疑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是这个理论导致的结果。产生这种看法，从理论上说有一个认识上的混淆，即把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完全等同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这是要加以区别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工作实践，并不完全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那些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一概都在克服和纠正之列。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言，并不存在什么反差；至于讲那些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关系，当然会存在反差。但这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那些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因此，不应当怀疑理论，而应当去努力克服实践中的偏向，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地转化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扭曲，不变形，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里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称职的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全身心的投入，又要有能正确地体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系列具体要求的、到位的方针政策。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出在这些中间环节上。这正是难点所在，也是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还需放开历史的视野，既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性，更要看到两者的共同性。就纠正前述的不同偏向来说，无疑需要强调不同的侧面。但是如果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就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而言，则应当强调两者的共同性。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于当代中国的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历史的现阶段来说，两者的差别性比较明显。但就历史的宏观而言，两者的共同性无疑是主要的。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几千年，称得上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能够治国平天下（实指安华夏）的，在古代要数孔孟之道。微观地看，孔学与孟学有无区别？当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是继承与发展中的区别。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不是两者的区别，而是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即孔孟儒学这个思想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治国之道，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在近代，虽有孙中山的理论，但不能与之匹敌，未能实现其治国安邦的宏愿。唯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华民族在当

代的治国安邦之道。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国无产阶级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继续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成为世界上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南。毫不夸张地说，毛、邓思想理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可以与古代的孔孟之道相媲美。“古有孔、孟，今有毛、邓”，后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政治贡献。

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对于科学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促进政治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纪念。增订再版拙著，也算是再次表达点心意吧。

本书尽管重新增订再版，但不妥之处可能还有，包括本篇感言可能也不尽恰当，衷心欢迎指正。

作者写于 1996 年春节前夕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序

“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泽东。”这是近年来知识界广为流传的话。乍听起来，似不顺耳；但细一琢磨，也不无一点道理。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巨人，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璀璨群星的杰出代表，在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有许多共同的品德和业绩为世人称羨，又有不少各自特殊的优点和长处为后代们敬仰。这两句话，既可看做是就他们的共性而发的，也可视为系就其特点而赞的。

毛泽东是研究不完的。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这已不再有人怀疑。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逝世时曾经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①我们虽然不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简单类比，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尽管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仍然感觉到了再拥有一个具备像他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哲人智慧的思想家、理论家是多么不容易！毛泽东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国内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斯诺在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是介绍毛泽东的最早作品。最近见到一个材料说，还在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合刊上，一个署名为“赫”的作者就撰文介绍了毛泽东。在“赫”的将近7000字的文章里，尽管对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的介绍不准确，讹误不少，但作者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来宣传的，并着意刻画了他的传奇性色彩。文章直写到毛泽东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国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为止。这个材料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它把介绍、研究、宣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献资料出现的时间，由1937年提早到了1935年。第二，过去研究者们总认为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并不欣赏毛泽东，然而从这篇文章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如果说对毛泽东生平的介绍，外国人早于中国人的话，那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

^①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